

新民晚报

在哈瓦那机场经过冗长的入关手续后，坐上车去哈瓦那老城的民宿。12月是古巴的旱季，中午气温仍能达30摄氏度，却不闷热。

连接机场和市区的公路宽阔平整，路旁是齐整的绿化，偶尔能看到几幢破旧的厂房模样的建筑。路上的稀疏车辆大多是很有些年代的，三四十年的别克和福特，一辆辆在身后呛出大团大团的黑烟。黑烟在空气中弥散开来，浓烈的气味很快充斥鼻腔。在古巴的一周时间里，这气味忠实陪伴我们左右，它也成为我留在记忆里中的古巴的气味。

哈瓦那老城里，到处都是西班牙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类极尽装饰的建筑。可惜大多已年久失修，有的只留下一个躯壳，顶层甚至已有热带藤蔓植物牢牢地长进了墙壁里。可是，即便经过岁月的洗刷，这些建筑在加勒比的阳光

下，仍尽显魅力，静静地诉说着这个城市昔日的辉煌。市中心的住房大都四五层高，长长的巷子两旁的房子连成一片。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风格和颜色，里面却住着多户人家。我们的民宿在一栋颇像国内早年的筒子楼里。过道很长，水泥楼梯的棱角也已被磨平，但楼道里干干净净，似乎展现了楼里居民的精神面貌。各家阳台外的晾衣架上，摇曳着花花绿绿的衣物，让我想起老年的上海。

老城中心有仍在修缮的国会大厦，气势恢宏。一街之隔的大剧院，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规模，可与我见过的欧洲任何一座历史悠久的歌剧院媲美。当晚有芭蕾舞演出，华灯初上时，盛装的男女老幼从各个方向向大剧院走来，成为另一道风景。在这个物

质极为匮乏的国度，人们仍能带着仪式感去接近艺术，着实让人感动。倒是在别的地方，有人会穿着牛仔T恤去音乐厅。不知这种随意说明艺术更接近普通人了呢，还是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已让人们失去了细致装扮的时间和心境？

哈瓦那印象

宗蕾

哈瓦那随处可见到格拉瓦拉的画像和带格拉瓦拉头像的各类纪念品，以及各种纪念卡斯托罗领导的那场革命的标语，却很少看到卡斯托罗的画像或雕塑。打听之后得知，卡斯托罗虽深受古巴民众爱戴，但他反对个人崇拜，拒绝为自己树立立像。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何塞·马蒂的雕像，他是反对西班牙统治、争取古巴独立的民族英雄。

来古巴前参看的不少攻略都强调去饭店吃饭需提前一天预订。为了不至于因订不上饭店而饿肚子，我们带了一箱方便面。不过，那些攻略显然没有跟上发展的步伐。哈瓦那老城有很多饭店，旅游景区的街角甚至有人拿着菜单，招呼游客前去就餐。哈瓦那那店提供的餐食和后来在民宿吃的很类似，主菜可选肉食或海鲜，外加一份包括西红柿、黄瓜和卷心菜的色拉，以及拉美风味的黑豆饭，每人每餐10至15CUC。CUC是一种类似于外汇

券的货币，1个CUC差不多等于1美元的价值。

饭店的餐食对于我们来说价格合理，却不是一般古巴人能消费得起的，因为据说老师和医生每月的工资只有20CUC。古巴仍实行配给制，配给的食物包括大米、豆子、鸡蛋以及油盐糖咖啡等，配给的东西按市价的12%出售。配给的食物有限，比如每人每月可买10公斤米，6只鸡蛋，250毫升油，每10天2公斤肉等。牛奶只供应给12岁以下的孩子、孕妇和65岁以上的老人。配给有专用的货币，配给以外的食物需按市场价购买。街上供应配给食物的店铺外经常排着长队，在不多的供应配给外食物的店铺里也常常挤满了人，而货柜却是空荡荡的。

朋友说去古巴可以减肥，情况却恰恰相反。当你看到人们为购买食品排起的长队，当你想到民宿女主人可以为客人烹制一顿顿可口的饭菜，却不能为家人准备同样的饭菜时，你若再不把桌上的食物都吃完，会有负罪感。我们因此而顿顿吃成了十二分饱。吃饭不成问题，但确实买不到其他食品。街边小贩的木板上大多只有当季的西红柿、橘子和芭蕉，长相都挺难看，不过，这些应该都是名副其实的有机果蔬。那箱方便面最终还是被我们当点心消灭了。



这可能是个奇迹：日本导演山田洋次在85岁高龄时，推出《家族之苦》，然后一年一部，这个系列电影，迄今已拍摄了三部，而且，还有持续拍摄的气势。要知道，《寅次郎的故事》，他拍摄了48集。我首先看他的电影，还是30年前的《幸福的黄手帕》和《远山的呼唤》。这是一个创作力旺盛的导演。

不要以为，这部系列电影，聚焦一个家族，其实，“家族”就是“家庭”，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家庭。我们去看看它的成员：70多岁的老爷子平田周造，太太富子，大儿子幸之助，大儿媳史枝，女儿成子，女婿泰藏，小儿子庄太和他先女友后妻子的宪子……山田洋次驾轻就熟，把家庭中的成员，刻画得如此个性鲜明，以至于我们闭上眼睛，他们一个个鲜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老爷子任性、固执，还常常喝得醉醺醺，老太太逆来顺受，近来激发写作的热情；大儿子在公司任职，时常出差，脾气火爆，常和老爷子、妻子拌嘴；大儿媳强势、能干，操持着这个家的里里外外；女儿咋咋呼呼，是一个注册税务师；女婿靠妻子吃饭，搞笑，说话总不合时宜；作为钢琴调音师的小儿子，稳重，是家庭的黏合剂；小儿媳在医院做护士，善良、温柔……

《家族之苦》是喜剧，但山田洋次制造着“苦”味：老爷子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让老太太生出不满；大儿子总认为自己赚钱养活家人，轻忽了妻子家庭主妇的重要职能，使妻子顿生委屈和怨恨；女儿和丈夫吵架闹离婚是家常便饭；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也常有意难合之时。假如你以为这是一部低沉的电影，那就太不了解山田洋次了，他制造着苦，但在“苦”中，让你品尝甜，品尝笑，品尝乐，品尝你永远羡慕的大家庭的温暖。

《家族之苦》是庶民剧，山田洋次向来擅长把镜头对准普通民众。和其他导演不同，他记录现实生活，绝不是自然主义的照搬照抄，人物总有夸张的喜剧表

演特色；他重生活细节，琐碎、真实，但电影不是平铺直叙，总有一个戏剧性的内核存在。《家族之苦》第一部，当全家人按部就班地生活着，老太太突然向老爷子提出了离婚要求；第二部，全家人正为老爷子安全着想，考虑如何让他放弃开车时，老爷子高中同学之死，扰乱了他们的生活；第三部，因小偷闯进他们家，大儿子过分的话，惹得大儿媳负气离家出走。每一部，寄托在大量生活流的节拍上，都有一个重大事件呈现，围绕这个事件，人物、叙事，妥帖有致地走向最终结局。

山田洋次在《家族之苦》中，每一部都会安排家庭会议，而且总在紧要关头，这似乎是一种程式。第一部，讨论老爷子老太太离婚问题，因女婿的冒失，老爷子昏厥过去；第二部，讨论没收老爷子驾照问题，老爷子留宿在家的老同学突然死亡；第三部，两次讨论大儿媳出走问题，一次探究出走方向，一次研究不回归的结果。很有意思，每次聚会，都要预订外卖——鳗鱼饭。第一次，鳗鱼饭送达，老爷子去了医院；第二次，死了人，谁有心思吃鳗鱼饭；第三次，大儿媳在大儿子的诚恳道歉下，回到大家庭，全家人终于快快乐乐享用了一顿鳗鱼饭。

让人不得不佩服，如此重大事件的化解，却在和风细雨中进行。第一部，大男子主义的老爷子，在当时还是小儿子女儿的宪子劝说下，向老太太真诚告白：“结婚45年来，能和你在一起，真好。”引得老太太当场撕毁离婚申请：“能听到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我会陪你一辈子。”第二部，原本不愿送老爷子老同学最后一程的家人，最后齐齐聚集在火葬场，老爷子“这个家崩塌了”的感叹变成了“好幸福”的赞词。第三部，大儿子在小儿子的规劝下，鼓起勇气接回妻子，他对大家说：“我曾说过，我真是受够你们这帮家人，现在，我撤回这句话，这次多亏大家，才撑了过来……”毫无疑问，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家族之苦

刘伟蓉



读碟

导游风趣添游兴

德行

今年，我从申城出发参加了一次厦门跟团游，当地导游小汪精彩生动的讲解和诙谐幽默的谈吐让我们倍添游兴。

我们一坐上从高崎机场开往集美学村的旅游大巴，汪导就奉上了一段开场白：“来自上海的各位晕倒和迷路，你们好！在闽南话里，晕倒就是帅哥，迷路就是美女。我是汪奇雯，你们就叫我汪导游吧，但千万别去掉姓直接叫我‘导游’。在闽南话中‘酱油’的发音也是‘导游’，所以别给我起外号哦。”众人听了忍俊不禁。

在厦门期间，我们先后拍过两次集体照，进一步领略了汪导轻松幽默的风格。我们首日赴归来园参观，汪导临时客串导演，安排我们合影。见全程陪同导游陈昌海即将摁快门，汪导冲着我们既不喊“茄子”也不喊“Cheese”而是问我们：“西瓜甜不甜？厦门美不美？”随着众人“甜——”和“美——”的应答声，一张张甜美的笑靥瞬间定格在镜头之中。第二天游览菽庄花园之前，汪导得知大家想再度合影，就故意卖了一个关子：“等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找一个靠山。”俄顷，她把我们带到了海滨的两排海棠树旁，并指着一座远山说：“瞧！我给你们找到了靠山。”众人极目远眺，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所说的靠山就是著名的日光岩。我们遂面对日光、背对日光岩请陈导游给我们拍了一张其乐融融的集体照。

在乘大巴去鼓浪屿的半道上，为了让大家对厦门的地理概况“了如指掌”，汪导就请每个人伸出左手，摊开手掌，借此上了一堂生动的地理课：“我们厦门共有6个行政区，手掌代表思明区，它包括厦门岛南部和咱们这会儿要去的鼓浪屿。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依次代表湖里区、海沧区、集美区、同安区和翔安区……”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汪导擅长运用双关语来增添“笑果”。离开厦门前一天，我们在“琴岛”享用了午餐。餐毕，汪导便安排我们大群人马到港仔后海滨自由活动并特意叮嘱踏浪的人：“注意安全，别去深水！你们可以湿（失）足不可以湿（失）身哦，但偏要湿（失）身去当湿（诗）人，我也不拦着。”大伙儿听了，笑声四溅。

有次乘大巴回宾馆的路上看到了BRT，汪导问我们：“你们知道吗？我们厦门的BRT快速公交既省时间又方便快捷，从第一码头坐快1路到厦门火车站只需10分钟。猜猜看，这段路厦门本地人刷交通卡乘坐BRT需付多少钱？”大家七嘴八舌地瞎猜，但均未猜对，这时，一名男士说：“我猜是3角钱。”汪导笑而答曰：“恭喜你答对了！我觉得你好像不是一班（般）的人而是二班的人。”

汪导对游客的友情提醒也融入了幽默元素。为了防止行程第三天鼓浪屿的大客流冲散我们团队而导致队员听不清其讲解，她就我们的游轮启航驶往该岛之前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副耳麦并巧用拟人修辞手法嘱咐道：“你们要呵护它，和它不离不弃，可不能抛弃它哟，不然它会伤心的。”第四天，在我们参观风光旖旎的厦门大学前，她特意提醒我们：“记住，厦大警卫室的保安只认你的身份证，不认你的身份。如果不带身份证，那么你的身份再特殊，社会地位再高，他们也不让进。”

人在旅途，我们都因为她风趣的话语而忘却了劳顿，增添了游兴，收获了欢乐。



紫竹院小景 (中国画) 刘旭

沉淀下来的不仅仅有菜肴，更重要的是，沉淀了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精神。

1928年秋天，朱德、毛泽东领导红四军第十师（师长朱德，党代表宛希先）的一部分曾在拿山村驻扎了两个多月，主要任务是休整部队、筹集军粮，并到附近的茶坪、北岸、厦坪、菖蒲、小通等地宣传发动群众。

红军白天在祠堂学习操练，晚上则露营地在村下面的柏树下，红军选择在柏树堤下露营，一是不扰民，二是防偷袭；因为当时根据地周围土豪白军猖獗，而柏树堤下秋收后四周空旷，视野开阔。由于红军纪律严明，赢得了乡亲们拥护爱戴，当时拿山村各家各户都集粮给红军，并帮助照顾红军伤病员。村里张本生、张义发、张特发等一批后生都参加了红军。经解放初统计，拿山籍的革命烈士就有26位。

据拿山自然村张积霖（81岁）、龙福媛（女，94岁）等回忆，小时听大人说起，1928年秋，在村东面五雷仙山上，红军曾与白军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反阻击战，至今战壕、碉堡弹痕犹在。据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乡、村实地勘察考证，这是当年红军要离开井冈山时的第一仗！去年金秋十月，井冈山市博物

馆、乡、村领导、井冈山部分转业退伍军人、村民和孩子们在现场隆重举行了立牌仪式。告慰英烈，继传未来。

老红军女战士曾志在她的回忆录里深情地写到：“当年才十八岁，人生第一次醉酒就在拿山村，老表从二楼拿下一坛酒，坛口上封着

“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起点和终点”

袁晓赫

黄泥巴，底层是竹叶，打开后酒香撩人，老表热情好客，所以情不自禁喝醉了。当时还有彭德怀、陈毅、肖克、粟裕、何长工等老红军，都在拿山村驻扎战斗过。”

1962年3月，朱德委员长（时年76岁）重上井冈山时，他特别交代：“在拿山吃了中饭再上山。”

1965年5月毛主席（时年72岁）重上井冈山时，也念念不忘拿山，向当地干部问起：“拿山在哪个方位？”

可见，当年红军与拿山村的老表结下了多么深厚的革命情谊！

毛主席、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革命家惦记拿山，是有深刻原因的：拿山是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重要坐标。

1927年10月，毛泽东上井冈山创建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1928年11月，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详细表述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具体范围：

“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龙（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田、五斗江、车田（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

拿山是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起点也是终点。

而今，拿山村已作为井冈山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被誉为“井冈第一村”。

仰望望着在拿山村原址建起的井冈山火车站和井冈山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油路、水水路、可通达全国各地的铁路线，就想起井冈山当年红军留下的“红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工农红军为工农”标语，脑海里总不断地涌现出在当年小道上挑粮、打仗的红军、爬山涉水上井冈的500名省市干部、参加“马路”“油路”“铁路”建设者的身影。

十日谈

井冈山古道今昔 责编：贺小钢

记得刚学电脑打字时，用的是五笔字形。在打“黄”字时，怎么也打不出来。数番努力无果，查了字典才发现，黄的中部是由而不是田，难怪电脑上打不出。写“善”时也是如此，写完美字的上半部，下面的草字打不出，也是查了字典才知道，善的中部是两点一横。相同的情况还有“沛”字，写完三点水，加上市字就是出不来，也是自己将字写错了，“沛”字的右端不是市字，没有上面的一点，最后是从上到下的一长竖。

打字趣事

哲俊

中国的文字有的字相似度很高，但读音根本不同，常常让人产生混淆，我就因为不认真，常犯这个错。比如汨罗江的汨罗，我常将它和眼泪汨汨的“汨”字搞混。直到多少年后才搞明白，这两个字的右边一个是日，一个是曰，虽然外形相同，具体写法是有区别的。汨罗江的“汨”右边是日，而“汨”字右边不仅形扁，且中间一横是不到头的。

据说，中文的常用字有一两千个，别看这些字，要写得准确标准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字我们写了几十年，却会突然发现自己写错了。别说外国人认为中国字最难学，就是中国人又有几个能将中国字都认全了呢？

中文从文字到韵律，从寓意到内涵，都十分丰富。对于从小就学中文的我们来说，要体会中文文字之美，也要维护它的纯洁，要将每一个中文字写好写准确。过去写了多年的错字而不觉，自从学了电脑五笔字形打字，写了错字就打不出，逼着自己去查去改正，反而成了退休后的一件趣事。

